



深圳文学的时代书写、创作困境及突破方向

■ 陈劲松 (广东)

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5周年之际,由中国作协创研部、深圳市文联主办,深圳市文联创研部、深圳市作协、深圳市评协承办的“改革浪潮中的深圳文学力量——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现象”研讨会,2025年底在北京举行。报道称,与会者围绕深圳文学与新大众文艺、深圳文学与新时代文学、深圳作家群现象、深圳文学发展史论、深圳文学的使命担当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。此前不久,第26届深圳读书月期间,鹏城文学院正式揭牌成立,标志着深圳在文学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。两件文学盛事叠加,不禁引发了我对深圳文学现实境遇及未来发展的关注与思考。

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45年间,伴随改革开放的蓬勃历程,深圳文学取得了斐然成就,为广东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深圳故事和创作经验。尤其是新时代以来,深圳在发展文学方面不遗余力,譬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和文学精品创作,打造“深圳文学季”和青年文学品牌项目;实施“全民写作计划”,培育“新大众文艺”,激发市民创作热情;鼓励作家“破圈”跨界创新,探索“文学+”模式;设立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,发掘一批青年科幻作家,孵化深圳科幻

文学IP;提出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”概念,举办“大湾区杯(深圳)网络文学大赛”,推动大湾区文学一体化发展。正是这种因地制宜、多措并举的努力,让深圳文学在持续书写“春天的故事”征途上,步履坚实,硕果累累。然而,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深圳文学亦不例外,在收获诸多成就的同时,还面临诸多困境。如何从困境中转变创作视角、寻求突破方向,进而推动深圳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,这是摆在创作者和研究者眼前的一道时代命题。

一、深圳文学面临的四重困境

其一,身份认同的迷茫与个人创作的焦虑。面对深圳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复杂性,不少作家经常在文字及情感上颇为“撕裂”,对于究竟哪种表达才是“真实”的深圳,无从下笔;故乡与他乡的现实和精神纠葛,让作家们丧失自己的写作根据地。由此在人物塑造上,往往难以确立并找到人物的心灵归属。作家邓一光曾指出,深圳文学具有强烈的“漂泊感”和“悬浮性”,具体表现为异乡生活的内心焦虑、现代化生活的挤压、身份确认的恐慌、文化的盲目与盲从等。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,在城市化浪潮

高涨的当下,更让身处其中的作家感到迷茫和焦虑。

其二,文学经验的贫乏与创作空间的单一。诚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言,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高度雷同,甚至活在外界舆论塑造的、并非自身真正渴望的经验里,以致不少作家仍主要将深圳视为社会、物理或技术的空间,未能将其充分转化为艺术、审美和文学的空间来书写。文学固然源于生活,但就像苏格拉底所说,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,缺乏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同样不值得写。

其三,“破圈”传播的不足与市场生存的压力。文学边缘化的今天,面对日益严峻的发表及出版环境,面对广大读者的审美变化及期待,一些作家依然只顾闭门造车,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生存法则,更遑论推动作品“破圈”创新、跨界发展,进而提升整个深圳青年作家群体在全国范围内的辨识度和影响力。

其四,技术变革的颠覆与人工智能的冲击。一方面,人工智能写作快速更新迭代,部分作家无所适从,甚至失去创作信心,在AI写作与个人创作之间进退维谷;另一方面,部分作家陷入“投喂”模式,过度依赖人工智能,在AI写作与个人创作之间迷失方向。

当文学遇上AI,我们的作家如何写出有力量、有温度的文字,在智能时代守护“人的笔迹”?这无疑值得所有作家深思。

二、深圳文学转变的三个视角

上述种种困境,均使深圳文学创作亟须调整并深化创作视角,形成新时代独特的文学风貌与创作风格。具体而言,如何调整?

一曰“小切口”与“大图景”的融合。批评家谢有顺认为,文学的重要责任,在于俯身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,打捞那些沉默的声音,为无声者发声。所以,深圳文学不必总是试图进行宏大叙事,卑微的生命、弱小的群体同样值得关注,因为“任何有关城市的宏大叙事最终都需落地于人的所思所想所为”。譬如邓一光的《你可以让百合生长》等南方短篇小说系列、南翔的《伯爵猫》《钟表匠》等城市文学作品、吴君的《万事如意》《阿姐还在真理街》等中篇小说、蔡东的《月光下》《薄冰上》等短篇小说,以及李兰妮、王国华、秦锦屏等人的散文创作,谢湘南、费新乾、程鹏等人的诗歌创作,无不是现代化深圳场域中各式小人物的“彷徨”与“呐喊”。准此,每位深圳作家应

基于自身生命体验,从不同角度书写城市,通过“小切口”共同构筑完整、立体的深圳文学“大图景”。

二曰在地性与世界性的交汇。深圳作家应深入思考、着力描绘“从物质层面的深圳人变成精神层面的深圳人”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,因为这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主题。要站在命运共同体高度,书写人类共通的情感价值,让深圳故事成为连接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国别文化的桥梁。譬如邓一光的长篇小说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、南翔的中篇小说《洛杉矶的蓝花楹》,扎根深圳,俯瞰世界,以深圳作家视角写出了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般的情感记忆,深刻体现了深圳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通。

三曰历史感与未来感的互通。在热情拥抱未来的同时,深圳作家也应注重“回望”与“寻根”,譬如采取非虚构方式,关注古村落保护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题材,在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,保留一份历史温情。这方面,作家南翔致力于三个“打通”的创作方法值得借鉴:历史与现实打通、虚构与非虚构打通、自己的经历与父辈的经历打通。他的中篇小说《打镰刀》《老药工和他的女儿》,以及非虚构《手上春

下转 12 版

上接 09 版

派的兴起,以《春秋公羊传》为研究对象,重提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思想,标志着公羊学派的重新崛起。庄存与《春秋正辞》、孔广森《春秋公羊通义》、刘逢禄《公羊何氏释例》、宋翔凤《论语说义》、凌曙、龚自珍、魏源、陈立《公羊义疏》、康有为《托古改制》等,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,主张“天无二日,世无二王,国无二君,家无二尊,以一治之”,实现拱奉王室,垂拱而治。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鸦片战争爆发前后,龚自珍、魏源打出“公羊学”旗号,探究东汉末何休所谓《公羊传》中的“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,借经学议政事、改风俗、思人才、正学术,把“公羊学”研究与经世、救亡、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、魏的传统,从皮锡瑞、廖平到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都是源于龚、魏假“公羊改制之义”进行维新变法,实现“托古改制”。

四、对孔学和董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。

该书对孔学与董学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比较。在第一部中,重点论述董学的本质,

集中分析了董学的体系,涉及核心概念体系、方法论等政治哲学、教化论以及在国家体制方面的设计和政策建议诸方面。第二部是孔学的本质,集中分析了孔子的思想,涉及核心概念体系、理念、方法论。

董仲舒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为“三纲五常”,“三纲”主要是“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。“五常”主要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。其与孔子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,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没有“三纲”的。孔子确实主张要讲分明的社会等级,提出了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即做君主的样子,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,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,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。董仲舒与孔子提出的社会等级秩序都属于道德规范要求。

“五常”也是做人的五种行为规范,但是现今传世的儒家“五常”的思想,根本上讲是源于墨家的思想,孔子承袭,孟子延伸,董仲舒光大后而形成的。最早墨家学派提出了“五常”,内容包括“礼、义、爱、信、忠”,并且墨家学派还进一步解释了“五常”的含义分别是指:“礼敬、义恪、爱恭、信严和忠畏”(见考古最新发现的清华简《五纪》篇),

从中可以发现,墨家“五常”是讲忠信思想的。而郭店遗址出土的楚简中,儒生子思在《五行》把先秦儒家的五种行为总结为“仁义礼智圣”,可见,先秦儒家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,都不提倡讲忠信的,主张圣德、圣言和圣行。“君子贞而不谅”(孔子),“言无必信、行不必果,唯义所在,千人千义”(孟子)。所以,孔子思想只讲“仁、义、礼”,孟子延伸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,是董仲舒综合了墨家思想,扩充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,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五常思想。“五常”所倡导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,都是正能量的。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为核心内容的“五常”理念,也是我们人类世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做人的行为规范原则,以及做一个好人的基本准则。

孔子的天命观是讲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”,而董仲舒的天命观主要讲的是君权神授和“天人合一”以及“天人感应”学说。“天人感应”是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,是中国古代哲学术语,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、预示灾祥,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。这种说法古人有精炼的认知概况,例如,“观天之道,

执天之行,尽矣!立天之道,以定人也”(《黄帝阴符经》),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中就有这样的话:“道之大原出于天,天不变,道亦不变。是禹继舜,舜继尧,三圣相受而守一道。”这就是其以自然规律来端正人性,达到存天理定人性的依据。

董仲舒宣扬皇帝是“代天治民”,神化封建统治,带有神学倾向,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容,宣扬加强了中央集权。但是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思想,是结合了儒家、阴阳家等学说建构的,总体上是强调天和人类相通,相互感应,天能干预人事,人亦能感应上天。如果天子(皇帝)违背了天意,施行暴政,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警告;如果顺应民心,施行仁政,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。他的这种带有迷信色彩天人感应观点,对约束封建专制皇帝的行为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。由于天人感应理论,导致汉代君主在灾害发生以后常下诏罪己,并依此实行了一些惠民的政策。汉代最早因灾难下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,下诏悔过,说自己:“人主不德,布政不均”。汉武帝时期于公元前89年在轮台下诏罪己,下令减轻赋税发展农业,一改前期毫无休止征发民力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,

在汉代占据统治地位,这种灾异天谴理论,往往将自然界出现的灾害视为上天对君主大臣的警示,君主往往在此时检讨自身过失,以求痛改前非,这也是制约不断膨胀君权的最后一道人为天谴防线。

董学的天谴灾异说是继承了《春秋公羊传》中的一些思想,也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,这在其“董氏儒学”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。董仲舒治《春秋公羊学》与孔子还是有很大不同之处的,孔子的《公羊传》在申明微言大义时,过于隐晦,董仲舒则对《公羊传》中的辞序解释进行了理论性概括,并进一步推见至隐,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。董仲舒通过《春秋》序辞的书法,创造性地建构出其天人之道理论,而孔子的《公羊传》则主要以义传经,通过书法或笔法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。董仲舒在《公羊传》的基础上,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其解释方法和理论体系,特别是在序辞的微言大义和天人之道的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该书通过对孔学和董学的概念不同的对比,进一步印证了两学之间的概念内涵不同、体系不同和目的方法的不同。